

区域文化中的茶馆述论(续)

江西省中国茶文化研究中心 刘清荣

二、海派文化与上海茶馆

1、海派文化

“海派”一词最初指的是清末民初被称为“海上画派”的一群画家,这是一群与宫廷专业画家和士大夫画家不同的以卖画为生的职业画家。后来引入京剧界,指称一种在上海形成的创新流派的京剧。后又引入文学界,自20世纪30年代起,被借来指称与“京派”对立的一种现代的、解构传统的价值观和审美情趣的文学流派,“海派作家”大多聚居在上海。所以现在的海派文化泛指在上海地区形成的与传统相悖的区域文化。

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前沿,扼长江出口,倚东海之滨,向东是浩瀚无垠的太平洋,南临杭州湾,西与江苏、浙江两省毗邻,北界黄金水道长江入海口,正当我国南北海岸线的中部,交通便利,腹地广袤,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是世界第三大港和中国最大的港口。上海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由于上海居“中国门户”这样一个重要的地理位置,使得鸦片战争后的100多年中,上海成为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重要据点,也使得上海的历史呈现出开放性的特点。

上海古时为海边渔村,春秋时为吴国之地,战国时为楚国春申君黄歇封邑。相传黄歇开凿黄浦江,黄浦江因而又名春申江,上海别称“申”由此而来。吴淞江下游两岸居民多以捕鱼为生,渔民创制一种用以捕鱼捉蟹的工具“扈”,后“扈”演变为“沪”;古时又称独流入海的江河为“涑”,故上海被称为“沪涑”,简称“沪”。从汉代起,上海就有铸钱、冶铁、煮盐业。隋唐时期,随着江南经济的不断开发,上海一带的经济也得到较快的发展。唐开元初年,兴修了南起盐官、北至吴淞江的捍海塘。土地也得到开垦,逐步发展成为重要的产粮区。此后,市境人口及县镇渐增,规模日益扩展。唐天宝十年,从昆山、嘉兴、海盐三县划出地区设立华亭县,华亭县东北境内的华亭海,即现在上海市区的所在地。南宋咸淳年间,上海设镇,属华亭县管辖。当时上海作为新的贸易港口,已是风樯浪舶,商贾麋集之地。元朝至元年间,公元1291年8月19日,朝廷批准上海建县,此为上海建城纪念日,距今已有700多年历史。上海建县后,经济得到很大发展,棉纺织业和航运业是上海两大经济支柱。清康熙年间,开放海禁,上海的航运业得到空前发展。上海逐步形成内河航运、长江航运、南北洋航运和国际航运等多条航线,成为棉布进出口量最大的吞吐港,也成为海上贸易的中转站,聚集在上海港的船舶有时多达3000多艘。清乾隆、嘉庆年间,上海逐渐成为全国贸易大港和漕粮运输中心,被称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英军入侵上海、南京等地,上海作为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正式开埠。殖民主义者先后在航运、银行、洋行、加工、印刷、制药、建筑、公用事业等领域开办了一批近代企业。一批批外国冒险家先后来到上海,投机买卖,牟取暴利。上海成为冒险家的乐园。同一时期,清政府陆续在上海创办了一批近代企业,如江南制造局、招商局、电报分局、机器织布局等。民族工商业也得到相当发展,其中棉纺织、面粉、缫丝、卷烟等行业发展尤为迅速。上海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重要基地。伴随着经济发展,上海一度成为远东的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抗战初期,租界成为孤岛,经济出现畸形繁荣,日军占领租界后,经济一落千丈直至解放。改革开放后,上海再度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特殊的历史使得上海成为中西方文化碰撞的前沿,使上海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繁荣的工商业使得海派文化与和农业文明相联系的中国传统文化不同,成为背离中国传统的一种新兴文化,呈现出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同的别样风貌。

上海古时属于吴越之地,因而深受吴越文化的影响,吴越文化中的“重利”、“务实”、“开放”、“创新”、“精致和谐”在海派文化中都可以看到;近代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上海又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因而,可以说,海派文化实则是吴越文化和洋派文化的结合体。

(1)市民化、通俗化。海派文化是上海开埠以后才真正形成的。上海作为近代都市的形成过程也是市民社会兴起的过程。高度发达的工商业,工人、职员阶层的兴起,纵横交错的马路、狭窄的里弄以及俱乐部、公园、游乐场、工厂、商店等等,这一切都自然发展出与乡村社会很不相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需求,使得海派文化呈现出一种市民性。如果说京派文化是一种大气的、高贵的、底蕴深厚的,那么海派文化就是一种大众的、通俗的、白相的。它围绕市民的生活,贴近市民的心态,满足市民的口味和需求,提供了一种雅俗共赏的高品位的大众文化。从张爱玲的小说到鸳鸯蝴蝶派,从《良友画报》、《生活周刊》到连环画小书、月份牌年画,从京剧到上海后就被改造成更贴近现实和通俗化的海派京剧中都可以看出这一点。

(2)现代化、市场化。上海是在西方文明的吹淋下成为近代都市的,因而海派文化自然呈现出其现代性的一面。在思想上,自晚清以来,上海就是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在中国传播的最大中心,现代西方的各种思想学说大多是由上海而影响全国的。在文学艺术上,西方现代的流派和类型基本上首先是在上海登台,从电影、话剧到管弦乐、爵士乐,从精神分析小说到象征派诗歌,无不如此。体现西方现代文明的种种机构,如报社、出版社、图书馆、女子学校、科技学校等也都是最早出现在上海。海派文化中的市场化因子一方面是秉承自吴越文化中的重商主义传统,另一方面和现代化分不开,经济上的现代化就是市场化。上海较早接受市场化的熏陶,形成按规矩办事和等价交换、重实利的意识。这种等价交换、重实利的意识深入到上海社会的方方面面,不仅存在于商人、朋友之间,甚至也进入家庭内部,父母、兄弟姊妹之间,上海人常说的“亲兄弟,明算帐”就折射出这种文化特征。

(3)求新求变,不受陈规束缚。上海这块土地上有类居住的历史虽然久远,但建城的历史不长,海派文化形成的历史就更短,文化底蕴不深厚;加之上海是一个移民城市,近代以来又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因而它较少受到传统的束缚,敢于探索创新,开风气之先。“海派”一词最初就是缘起于与众不同的“海上画派”,这一派的画家虽渊源各异,风格有别,但都具有反传统、逆时俗的求新特征。后来的海派京剧是以发明连台本戏,创造贴近现实、针砭时弊的时装新剧,起用光怪陆离的机关布景等闻名全国的,求新求变也是它的基本特征。说明“海派”一词本身就包含了求新求变的意思在里面。

(4)兼收并蓄、容纳百川。移民城市造就的移民文化,使海派文化有兼收并蓄、容纳百川的海量和气派。在这里,传统和现代、古典和通俗、东方和西方交汇,各种流派、各种思潮并存。在文学园,既有鸳鸯蝴蝶派和新礼拜六派,也有左翼、右翼、第三种人、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有三民主义等无所不包的文学作品;在美术园,在中国绘画由南宗而衍为海上画派的同时,上海成为新兴的油画、雕塑、版画、水彩画的基地。通俗美术在此也异军突起,各种画报、连环画、漫画、广告画、月份牌年画布满街市;在戏曲园,不仅京剧由南派引申出一个海派,而且在同一城市,所聚集的剧种之多,剧团、演员人数之众和阵容之强,也是全国之最。产自浙江的越剧、苏北的淮剧、宁波的甬剧、无锡的锡剧、苏州的评弹,皆因有广泛的追随者而在此成了气候。与此同时,被喻为“西洋派”的学堂乐歌、西洋音乐、电影和话剧,也在上海找到了市场,获得了发展的条件,上海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交响乐、电影和话剧的基地④。

2、上海茶业

上海是个商业城市,本身不产茶,所以它的茶业主要集中在它的茶叶贸易和茶叶消费上。早在17世纪,上海已成为一个繁盛的港口城市,到上海开埠以后,更取代其他的港口城市成为中国第一大的内外贸交易口岸。在19世纪末以前,茶叶贸易是我国对外贸易的最大一宗,因而上海也成为中国最大的茶转销口岸。同时,近代以后,上海成为我国的经济中心,又靠近江浙等名茶产区,因而上海茶市也是百茶荟萃的集散地,直到今天,仍然是全国茶市交易的集聚基地。

上海不种茶,但每年消费茶叶超过万吨。上海人爱饮茶,87.6%的人将茶作为最常用的饮料。茶叶年消费额10亿元,年交易额28亿元。上海也是茶叶消费发展最快的一个城市,10年前,上海地区人均消费茶叶

200克,目前已达到1000克左右,是十年前的四倍多,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00克。这得益于上海连续12年举办的上海茶文化节,宣传、普及了茶文化,提高了人们喝茶的兴趣和品味。上海还很注重少儿茶艺培训,多数小学都开设了少儿茶艺培训课程,带动了年轻家庭的茶叶消费。今天,上海有10000家茶企业,50多万从业人员,约6000家茶店,茶馆、茶楼、茶坊等3000余家;有形成规模的茶叶销售专门市场、零售连锁企业和品牌店,茶业发展一派兴盛。

上海有400多万外地人口,他们形成了现在上海多种流派、多种饮茶模式的消费格局。以前上海的茶市绿茶一统天下,现在,乌龙茶、白茶、红茶等不断进入上海市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品尝安溪铁观音、台湾高山茶、安吉白茶、祁门红茶等茶叶品种,并逐步形成一定的消费群体。有机茶的消费也在迅速上升,同时,保健茶、苦丁茶等功能性茶品也呈现出兴旺趋势。现在的上海茶市,60%是绿茶市场,龙井茶销售名列前茅,其次是乌龙茶、花茶,各占15%,其余茶品占10%。

3、上海茶馆

上海人秉承吴越人习俗,饮茶风气由来已久,到清朝末年,茶馆因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应运而生。大约在咸丰末年,同治初年,在繁华的南京路上出现了上海第一家大茶馆——洞天茶楼。此后,随着“十里洋场”的上海成为国际化的大都市,经济的繁荣和市民文化的昌盛,茶馆越开越多。据不完全统计,宣统元年(1909),上海当时共有茶楼64家,到民国八年(1919),短短十年间便增至164家,至1949年,仅南市老城厢就有各式茶馆169家。此外,尚有许多极其简陋的小茶馆,叫“老虎灶”,为一般劳苦群众暂坐歇脚、解渴消乏之处,遍布大街小巷。上海老城隍庙内的湖心亭茶楼,四面临水,两面曲桥相同,环境幽雅宁静,保存至今,仍是上海人品茗的好去处。

旧上海的茶馆按地域分,有广式、苏式、本地式几种。广式即广东茶馆。清末民初,在上海的广东人已很多。广东人素来讲究喝茶,不仅注重茶味、茶点,还注重茶具与饮茶的环境,而当时上海的茶馆大多嘈杂纷乱,广东人不愿涉足,于是广东人自己在上海相继开设茶楼。最早是光绪二年(1876)在广东路河南路口开设的同芳居、怡珍居等几家,后大受欢迎,广东茶楼于是遍地开花,单是从南京路到西藏路一段,就有居安居、陶陶居、大东、大三元、东亚、新雅等近十家,盛极一时。广东茶馆素以茶叶考究、茶具漂亮、点心精致见长,在上海的广式茶楼也不例外。茶客人座后,除了茶水,还有用小车推着送来各式精致的广东点心,诸如马蹄糕、叉烧包、蛋挞、烧卖等,还供应各种时鲜水果,并代为削皮,服务细致周到。苏式茶馆的建筑多与园林相结合,千曲百折,临池伴竹,红肥绿瘦,环境十分幽雅动人。茶馆内多有评弹表演,在室内一隅筑一小坛,供评弹艺人弹唱,壁上左挂三弦,右挂琵琶。茶客们边品茗边吃着苏式小点,边听着舒缓的苏州评弹,这才不愧了“偷得浮生半日闲”。本地式茶馆老城隍庙一带最为集中,它的特色就是一个字——杂。如老得意楼,楼下吃茶,门口有烧饼铺,来吃茶的多是挑夫贩夫等劳动者,来茶楼歇息、解渴、解饿的;二楼吃茶兼听评书,茶客多是一般市民和游手好闲的人;三楼供玩鸟者聚会,来的多是玩鸟爱好者和一些公子哥儿。人员杂,功能也杂,人们到茶馆来不是为了喝茶,而是来活动的。

按茶客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中高档茶馆,如湖心亭茶楼、育莲阁茶楼、如意茶楼、聚宝茶楼、一洞天茶社、丹凤茶楼和丹桂茶楼等。这类茶楼大多地处繁华市面或风景优美之处,楼房高大,不论是外部装潢还是室内装饰都比较讲究。茶室幽雅、窗明几净,并布置有内室、雅座。来的茶客基本上是中上流阶层的人,大多为达官显贵、社会名流、文人雅士、阔佬商贾以及在社会上已有地位的帮会头目等。另一类是低档茶馆,数量特别多,遍布街市里弄,比较典型的是一种俗称“老虎灶”又叫“熟水店”的茶馆。所谓“老虎灶”就是卖开水的小店铺。早先这种烧开水的大炉,炉面平整,下面埋口大铁锅,靠里面又砌两口小锅。人们从远处望去,两口小锅像双眼,大锅像老虎的血盆大口,那通向屋顶的高高烟囱就像一条竖起的老虎尾巴,故而上海人称之为“老虎灶”。老虎灶一般设在马路边,店面极小,能砌一个灶头的地方就可以开店了,桌凳就摆在街边。这类低档茶馆来的茶客都是社会底层人物,普通百姓,也有为数众多的游民、无赖、地痞。这类茶馆清晨即开门营业,供和早茶,一般到晚上九、十点关门打烊,中午不休息。每到中午,就有一些串街过巷箍木桶的、修雨伞的、磨剪子铲菜刀的、铜碗补锅的、摇拨浪鼓的、收破烂挑高箩的小商小贩以及走坊郎中、算命先生之类的角

色前来光顾。他们经过一个上午的走街串巷,来此歇脚,泡上一壶廉价的热茶,掏出干粮,边吃边饮,说笑逗趣,传播着听到的各类消息,看到的奇闻怪事⑤。

旧上海的茶馆名为茶楼,以茶招徕顾客,但是,除一些有闲兼且有钱的老人专为品茗而来外,绝大多数茶客都是以茶楼为场地,目的是进行各种活动。这一点与别地茶馆不同,虽然其他各地茶馆也有类似上海茶馆的这种情况,但远不如上海茶馆表现得这么突出。上海茶馆主要充当了这么几类场地:

新闻集散地。旧上海的茶馆来的人多且杂,各种新闻、小道消息满天飞,故而报社记者、巡捕房的巡捕、便衣侦探都是茶馆的常客。有的记者,尤其是晚报、小报的记者在茶馆听到消息趣闻后,往往当场在茶馆里草就文章,直接送往报社。而巡捕房的巡捕、便衣侦探不仅经常从茶馆中找到办案线索,有时就干脆在茶馆办案,把茶馆变成公事房。所以,旧上海有包打听茶会一说。包打听茶会是旧上海独有的奇特现象。旧上海的租界巡捕外出办案,捉到非政治性案件的犯人就在一些常去的茶馆设下公堂,动刑审讯,获得罪证后再押回租界的巡捕房。当然,这种茶客喝茶是不付茶资的,茶楼老板则倚仗他们的势力维持市面。

· 劳务市场。在一些中低档茶馆,经常有一些木匠、瓦匠、篾匠等以打短工为生的手工工匠一大早就来到茶馆吃早茶,当然他们的目的是寻找雇主。一旦找到,谈好价钱就随雇主上工,或顺便与工头们定好今后的去向。当然,需要找雇工的雇主也都知道要到茶馆去寻找这类人,这在旧上海已经是约定俗成了。

交易市场。旧上海的茶楼固定的茶客主要是一些商人。每日清晨,布业、糖业、豆业、钱业、丝业、茶业等各行各业的大商人都到各行常去的茶楼晤面、应酬,通过吃茶谈交易,达成一笔笔的买卖。所以,上海的茶馆早晨都兼卖茶点。一些实业家也到茶楼与人会面,联络感情。像著名实业家刘鸿生那时就经常出入青莲阁茶楼与人进行煤炭交易。在这批商人茶客中,有一种称为“白蚂蚁”的经纪人也是茶馆的常客,把茶馆当作交易场所。“白蚂蚁”是专门充当房屋顶租或买卖的中间人,靠提取佣金为生。由于“白蚂蚁”的存在,旧上海中凡有房屋出租出卖或租赁房屋、购屋的主顾,就到茶馆来吃茶,找经纪人。“白蚂蚁”就从中牵线搭桥,谈成了,就在茶馆订契约签押。当时上海人称这为“顶屋市场”。

解放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有一段上海的茶馆也和全国其他地方的茶馆一样,销声匿迹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忽如一夜春风来,茶馆又开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新上海的茶馆一方面保留了传统茶楼的特色,另一方面又加入了时代新内涵。新上海的茶馆在形式上虽然和旧上海的茶馆截然不同,但从茶馆文化的精神上看,却是一脉相承的,都与上海这个高度商业化的移民城市分不开,与兼收并蓄、求新求变的海派文化分不开。

(1)杂。这是上海茶馆的最大特点。这个“杂”,一是指进出茶馆的人员杂,二是指茶馆的功能杂。20世纪上半期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想淘金的人都云集这“十里洋场”,中国人、外国人、本地人、外地人、文人雅士、阔佬商贾、帮派流氓、贩夫走卒、工人、职员、手工艺人、无业游民等形形色色。茶馆是社会的缩影,从茶馆中可以窥见旧上海的社会百态。所以上海的茶馆不像北京茶馆那样泾渭分明,大茶馆、清茶馆、书茶馆、野茶馆等,各自功能不同,茶客不同。它虽有所区别,但总的来说,是鱼龙混杂,各色人等穿梭其中,显出其光怪陆离的一面。在同一个茶馆,你可以看到手工工匠在等待雇主;捐客、商人在谈生意;手提鸟笼的茶客在斗鸟玩耍;小报记者在寻找花边新闻;平民百姓在谈论家长里短,街头混混在传播小道消息。新上海的茶馆当然消除了这光怪陆离的一面,但仍然是一个“杂”字,这个“杂”体现在茶馆杂,服务杂。新上海的茶馆可以说是各式各样,既保留了传统的老式茶楼,又有新式的茶艺馆;既有广式、苏式、本地式,又加上了台式红茶坊以及西式茶坊;既有宫廷式气派的茶馆又有极简风格的茶室,等等,不一而足。在茶馆的服务上,也体现了一个杂。新上海的茶馆大多和餐饮结合在一起,除了提供传统的茶点外,还开发出了很多茶菜,甚至包括西式套餐、台湾简餐;茶饮的品种也丰富多样,除了传统茶品外,还有各类冰茶、奶茶、水果茶、西式花茶乃至咖啡。除在餐饮服务上下功夫外,新上海的茶馆还拓展了许多其他的服务。如与收藏、工艺品展销相结合;与戏曲、歌舞联姻;与茶艺、壶艺、厨艺融为一体;与休闲娱乐项目挂钩等等。像1991年开办的上海第一家新型茶馆——宋园茶艺馆,在服务项目上就是多种多样,除了茶艺表演、名茶品饮,还有茶菜服务以及中式婚礼、婚纱摄影、名茶(具)展销、评弹书场等多种经营项目,还经常举办书画、插花、工艺品展销等活动。而天

天旺茶宴馆除了以善泡安溪铁观音为特色外,还创制新潮条案 100 多款,将陶艺、奇石展、剪纸艺术等项目引进店堂。恒丰茶庄则以几代积存的 3 块木质铅版章和珍贵茶具为“镇馆之宝”,另内设吴昌硕画展、百茶展、百壶展等经营项目。

上海茶馆之所以这么“杂”,与它是个市民社会、移民社会分不开,与江浙人传统的善经营,重实利以及求新求变的海派文化分不开。

(2)经济功能突出。这是在上海这样一个商品经济发达的城市的茶馆与别地城市茶馆的必然不同。别地城市的茶馆也承担了各种社会功能包括经济功能,如成都的茶馆也有商人在谈生意,手工艺人在讨生计,小贩在兜售商品,雇工在等候被雇佣,也有充当经济活动场所的一面,但远不如上海茶馆这么突出以至于成为茶馆的主要功能。旧上海茶馆的主要客源就是各种以茶馆为场地进行经济活动的人,新上海茶馆的茶客们这方面的目的虽然有所削弱,不那么明显,但茶馆本身的经济功能增强了。或者换句话说,旧上海茶馆的经济功能主要表现在茶馆提供场地为各色人等进行经济活动服务。而由于现代社会经济活动场地的增多,茶馆已经不再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因而新上海茶馆的经济功能主要表现在茶馆本身增强了自己的获利能力,附设了很多别的经营项目,从而使使得新上海的茶馆一方面表现为“杂”,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它的经济功能超过了茶的社会功能和物质功能本身,茶文化也带上了金钱的色彩,这在别地茶馆中很少见。

(3)传统与创新并举、中方与西方交汇。上海这个城市是个中西方交汇的现代城市,也是个最能吸收外来营养为我所用的城市,因而在上海的茶馆里,各种元素都能看到,传统的、现代的、中式的、西式的。在装饰布局上,或复古,或民族风情,或现代派;在风格上,既有中式,又有港台式,还有韩式、日式、美式,真是百式格调,万种风情。各种茶文化一旦进入上海,就被上海人创新为具有地域特色的新文化。如茶菜本源于杭州,但在上海得到开发和发展;源于闽粤的乌龙茶进入上海,被演变为海派乌龙茶;茶艺源于台湾,但上海第一个创造了少儿茶艺。还有红茶坊,刚登陆上海滩时,几乎全线亏损。经营者改变策略,在布局和饮品上从吸引女孩子来消费人手,慢慢带动男青年,所以上海红茶坊的布置一般都充满女性的浪漫气息,饮品、食品也适合年轻人的休闲生活节奏,一般有热茶、冰红茶、冰绿茶、珍珠奶茶、特价小吃、套餐等,并有棋牌、飞镖等服务项目供年轻人消遣。这种中西方文化娱乐的交汇,使原本相对静态的“孵茶馆”、“泡茶馆”增添了动态的功能,茶客们在茶馆里可以“侃”,可以“玩”,使传统的茶馆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岭南文化和广东茶馆

1、岭南文化

中国古代的中原人称五岭以南的地区为岭南,又称岭外。五岭指的是秦岭最有名的五座大山脉,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和大庾岭,所以常用五岭来指代秦岭。秦岭横亘在湖南、江西的南部和广西、广东的北部,所以岭南指的就是今广东、广西一带,岭南文化就是指以广东为代表的地域文化。

广东位于南岭以南,南海之滨。北依南岭、东北为武夷山,南临南海,东面有世界最大的海洋——太平洋。地势北高南低,北部、东北部和西部都有较高山脉,中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多为低丘、台地或平原,因此整个地势向南向中倾斜。整个岭南地区的地理环境特点都是襟山带海,五岭雄峙其北,浩瀚的南海绕其南,境内的珠江水系为封闭的向心状水系。这样的山河态势构成了一个向南敞开的封闭、半封闭的地理环境。因此,历史上岭南文化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地域色彩,形成一个独树一帜的地域文化体系。

广东矿产资源、渔业资源和热带、亚热带植物资源非常丰富,是我国重要的稻米产区和热带作物、水果生产基地,盛产甘蔗、花生、茶叶、烟叶、黄麻、剑麻以及香蕉、荔枝、菠萝等热带水果。广东地处热带和亚热带,属热带、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高温多雨,长夏无冬,四季常青。这种湿热的气候特征使广东人养成了爱喝茶,尤其是祛湿去热的凉茶的生活习性。这种气候造成人体的消耗量大,所以广东人历来注重养生,加之物产丰富,鱼、米、瓜果、蔬菜四季皆有,成就了广东饮食大省的美誉,饮食文化成为广东文化的一大特点。

岭南地区古代比较落后,历史上开发较晚,长期被称为“蛮夷荒芜”之地。到了唐代,特别是明末以后,岭南的经济、社会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也是我国资本主义萌芽较早的地区。

尤其是到了近代以后,一改过去的边缘文化态势,不仅经济上是全国最发达的几个地区之一,政治上多次成为国内政治运动的中心和策源地,文化上更兼容中西,多有创新,在全国发生强大辐射作用,由一种非主导文化转化为主导文化。岭南历史是中原汉人不断南迁与南越土著不断融合、发展的历史。岭南虽远离中原,但自古已有先民居住。据考古发现,距今约1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岭南已有南越先民栖息繁衍。到西周时,南越作为一个族体已经形成,但发展比较缓慢。春秋时,岭南还处于“刀耕火种”阶段,属“蛮荒”之地,越族被中原华夏族视为化外之民。秦始皇33年,征发50万军民平定南蛮,统一岭南,设南海、桂林、象郡三郡管治,其中,南海郡就在现在的广东省境内,郡所在番禺就是今天的广州市。秦末,中原战乱,南海郡尉任嚣属下干将赵佗用兵自立,赵佗击并桂林、象郡,于公元前206年建立地跨岭南的南越国,自命为南越武王。南越国充分利用岭南襟山带海半封闭的地理条件,在秦末汉初中原战乱的情况下,割据一方,未受战乱影响,同时保境安民,发展生产,使岭南社会经济有所发展。南越国延续90余年,后被汉武帝派兵征讨灭亡。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原战乱又起,经济萧条,人口锐减。岭南则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环境保持社会稳定,而北方汉人大量南迁避乱,促进了岭南经济发展,但比之中原,仍落后不少。唐末安史之乱,北方又遭兵灾之祸,导致经济衰退,人口南迁,全国经济重心向江淮地区转移,而岭南未受战乱波及,张九龄重开了大庾岭道,加强了岭南与江淮地区的联系。这时的岭南沿海已被中央政府视为繁富之地,挑选岭南地方官特别严格,朝野上下均将到岭南沿海任职当作致富之道。其实这时的岭南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差异明显。岭南地区的三角洲、沿江、沿海一带经济发展较快,水平较高,广州早在汉代就已成为海外贸易中心,至唐代时更崛起为世界性贸易巨港;而广大的山丘地区,仍然是“火耕水耨”的草莽之地。因而在宋时,岭南都还是罪人或贬者流放之地。唐末岭南又出现了一个封建割据政权——南汉,历时55年。两宋时,当北部中国社会发生大动荡的时候,岭南地区却相对安定,社会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尤其是宋元以后,珠江三角洲、潮汕平原相继形成,地势平坦,河流纵横,土壤肥沃,交通方便,人口急剧增加,经济迅猛发展,大部分岭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中原及江淮地区。明清以后,岭南地区不仅在经济上成为我国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而且在政治上,一改过去远离政治的传统,多次成为政治运动的核心,特别是近代以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都是在岭南这块土地上发起的,新中国的改革开放更是率先在广东拉开帷幕。

岭南文化是在南越土著文化基础上,不断汉化,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融合其他民族和地域文化乃至海外文化的结果。越族是岭南地区的主人,他们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下独立地发展出了自己的与中原华夏文化风格迥异的南越土著文化。比如说,南越人受环境影响,除以稻为主粮外,还嗜食水产,包括鱼类、贝类,以及蛇、虫、鼠类等,令中原人深为惊诧。后世岭南人特殊的饮食风俗,很多是从南越先人那里继承下来的。又如,南越先人生活在烟瘴之地,自然条件恶劣,因而笃信巫鬼,流传到后世,使今天广东一带居民迷信思想仍很严重。秦统一岭南后,在南越推广中原汉文化。他们把中原生产技术、礼乐教化、风俗习惯、生产方式等带进岭南,陶冶南越族人,中原汉文化开始和南越文化相接触,并慢慢传播开来。晋室南渡,带来第一次民族大迁徙,北方汉族携家带口,渡江南逃,岭南成了中原各阶层人士避难和落籍之地。大量汉人的到来一方面推动了岭南经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使中原汉文化在和南越文化的接触中逐渐占了上风。至此,南越文化基本被汉化,和中原汉文化趋同。后来,历史上还有两次大的民族迁徙过程,一次是唐末的“安史之乱”,一次是北宋的“靖康之难”和南宋末年中原战乱,以及以后无论元、清,每逢战乱或饥荒,都有大量汉人迁入岭南,加速岭南经济、社会发展和汉化过程。南越文化在与中原汉文化相接触并逐渐被汉化的过程中,还受到荆楚、吴越、巴蜀文化的影响,使形成中的岭南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多元化还体现在岭南文化中有海外异质文化的元素。由于地理的原因,我国与海外交通要地,首在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就在广州,海外文化借着这条通道进入岭南。近代以后,海外文化更是大量在广东登陆,而岭南文化的兼容性也使岭南人主动吸收外来文化,极大地丰富了岭南文化。

从岭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来看,岭南文化有这么几个鲜明的特点:

(1)开放、兼容、多元。岭南文化的形成史就是多元文化碰撞、交流、融合的历史。由于岭南文化的本源——南越土著文化是一种弱势文化,也不存在悠久的历史,因而它在接受先进文化,诸如中原汉文化以及荆

楚、巴蜀、吴越文化时,没有排斥之心,岭南先民也没有“夷夏之防”的观念和“以夷变夏”的顾虑,而是以一种开阔的胸襟接受和兼容了这些文化,并成为自己的新文化。我以为岭南文化的这种兼容性和京派、海派文化的兼收并蓄有所不同。京派文化由于它悠久的历史 and 厚重的文化底蕴,兼收并蓄的结果就是被京派文化所同化,打上“京派”的烙印;而海派文化的求新求变使得兼收并蓄的结果就是被创新,成为一种新文化;而岭南文化兼容的结果就是多元化,在同一个时空,多种文化状态并存,这也体现了岭南文化中的一种宽容精神。

兼容的前提是开放,没有开放的胸襟和品质,不可能有兼容的结果。襟山带海的地理环境培养了岭南人开阔的胸襟,农耕文化中的固守土地观念在受海洋文化熏陶的岭南人这里较少体现,自古以来岭南人就有移居海外讨生活的习惯,近代尤甚。而优越的地理环境使得岭南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和通道,中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并以此为通道,向内向外传播。开放必然导致创新。在中国历史上,许多第一是由岭南人创造的或在岭南诞生的。如,第一个出国留学、第一个种牛痘、第一个办西医院、第一个办西式学堂、第一个办新闻报刊、第一个制造飞机、第一个倡导西学民主政治,等等。

(2)重商务实,不尚虚名。岭南远离政治中心,相对而言,对政治、文化比较淡泊;同时较少思想禁锢,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重视在实际探索中解决问题,因而岭南文化有求实用、重功利的倾向。南越族作为百越一支,其文化特征与百越其他支系是相通的,吴越文化中的重利、务实也是南越文化的一部分。海洋文化本就是一种商业文化,岭南深受海洋文化的影响,商贸业素来发达,海外贸易尤为兴盛,而历史上多次移民潮更加重了岭南文化中的重商色彩。一般而言,移民的政治诉求、文化诉求弱,经济诉求强,比较重经济实惠,在移民聚居的地方,商业气氛浓厚。岭南的思想家也对这种重利务实思想大加赞赏。如岭南近代思想家何启、胡礼垣在其著作中对中国人的重义轻利观念作出批判,直言求利乃人之本心,人之能利于己,必能利于人,不能利于己,必致累于世^⑥;康有为也主张济人经世,不作无用之空谈。正是这种重商务实的传统,才使得广东在改革开放后,不争论,求实际,率先实践市场经济。

(3)平民化、世俗化。岭南文化的平民化、世俗化和它重商务实的价值观和行为取向分不开。岭南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历史上是一个市场社会,它的重商务实观念使它的文化是一种充满商品意识的世俗文化,“重商”、“重钱”、“重用”是它的基本特征。“重商”即重视经济活动,把精力都放在“商场”,而不是“官场”、“战场”或“考场”;“重钱”即重价值,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好的效益,这是广东人经济活动的行为模式;“重用”即重消费受用,包括实用和享用,广东人对商品的要求既讲实惠、实用,又讲享受。所以,近现代以来,岭南文化趋向于平民化、消费型。

2、岭南茶业

岭南地区产茶自唐始,据清屈大均《广东新语》云:“西樵号称茶山,自唐曹松移植顾渚茶其上,今山中人率种茶”,屈大均还列举广东茶的产地,如广州的河南三十三村、西樵山、鼎湖山、罗浮山、潮阳凤山、琼州等。唐陆羽《茶经》记载当时全国有八大茶区,岭南居其一。陆羽曾应岭南节度使李复之邀,到广州做他的幕僚。由此,他所创造的一套茶学、茶艺、茶道思想就在广州流传开来,茶文化在岭南从此萌生发展起来。宋代时,由于全国气候变冷,产茶区南移,岭南之地茶产区开始多了起来。据宋《太平寰宇记》记载,我国最南的产茶区岭南道有封州(今广东封州)、邕州(今广西邕宁)、容州(今广西容县)。到明清时,岭南茶业兴盛,不仅茶产区扩大,名优茶出现,清广东按察使张渠在《粤东闻见录》中指出广州名茶除河南茶外,还有珍品如“肇庆之鼎湖茶,惠州之罗浮茶,化州之琉璃茶”等,茶叶贸易也很繁荣。从清朝开始到鸦片战争时期,共200多年时间里,中国的茶叶统占了世界茶叶交易市场,也就是说,全世界的茶叶基本都来自于中国,而广州是中国的茶叶走向世界各地的一个主要通道。

岭南茶业兴盛除了和岭南经济、社会发展有关,还和岭南地区的天气有关。岭南地处亚热带,日照长、气温高、流汗多,人们需要通过饮食来补充大量的水分,因而岭南人民养成了爱喝汤,嗜吃茶的习惯。正是这一习惯为岭南茶叶生产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当然,随着岭南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岭南茶文化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喝茶从最初的满足生理功能的解渴到享受到加上各种经济、社会功能。从广州人历史上对喝茶的不同称谓就可以看这一点。广州人常将喝茶称为“饮茶”,这个颇有古风的称谓可以上溯到西汉,广州人饮茶的历

史正是从西汉初年开始的。在汉代,广州人称喝茶为“饮茶”,这个称法也体现了茶的最基本功能——解渴,说明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不高。到了唐宋时期,则改为“斗茶”,特别是宋徽宗年间,皇帝曾亲自提倡斗茶。这说明当时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人们可以通过品尝不同的茶进行比赛,比比谁的茶更好更香。到了清代,人们将喝茶称为“品茶”,说明人民的生活又有提高,开始细心品味茶叶的优劣。而现在,大部分广州人喜欢称“叹茶”,“叹”在广东俗语里就是“享受”的意思,说明现在的广州人喝茶更多地是为了寻求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岭南地区由于有重商的传统,经济活动比较频繁,它的茶文化比别地更富有特色,如广州人爱饮“早茶”,潮汕人爱饮“功夫茶”,这都与经济活动有联系。

岭南茶文化的丰富还体现在它独具一格的凉茶业。地处亚热带的岭南地区,气候十分湿热,加上岭南人民的劳动时间长,又习惯夜睡,所以很容易上火,先民们为了除湿去热,便将一些清热解暑、去湿消滞、滋阴润燥的中草药煎煮配制成各式各样的药茶饮用,扶正驱邪。凉茶是我国丰富多彩的茶品中的一朵奇葩。后来,为了方便人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饮用到热热的凉茶,专门熬制凉茶的凉茶铺应运而生,起初的凉茶铺最为典型的标志就是摆放在门面上的大葫芦,人们只要一看到这个大葫芦,就知道这是卖凉茶的。百年后的今天,凉茶铺已经不再是当年的一个大葫芦,几个小茶壶和一块店招牌了,通过市场化运作和现代化的生产工艺,具有浓郁岭南特色的凉茶被制作成罐装茶饮走向大江南北,凉茶铺也改头换面成了现代工业企业。2006年,由广东、香港、澳门联合申报的凉茶已被批准为我国首批 581 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申遗成功后,大大促进了岭南凉茶业的生产和消费,2005 年,广东地区企业的凉茶产销量已超过 100 万吨,2006 年上半年产销量已近 300 万吨,古老的凉茶业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凉茶业的成功是岭南商业文化和茶文化的完美结合,为我国茶业的现代化指出了一条道路。

3、广东茶馆

广东人爱喝茶是出了名的。以广州为例,2003 年,广州人均年茶叶消费量高达 1600 克,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是全国人均年茶叶消费量的 5 倍,可以说,广州居民在生活中“不可一日无茶”。广东人爱喝茶,商品经济又发达,喝茶自然从家庭走向社会,因而广东的茶馆多是势所必然。广东茶馆数量号称全国之最,但它的茶馆可以说是会馆,真正饮茶的茶馆数量倒没那么多,这可以看作是广东茶文化的一大特点,即它的茶文化属于饮食文化的一种。

广东人上茶馆爱说上茶楼,这有个来历。清光绪年间,开了一间“三元楼”大茶馆,楼高三层,装饰摆设极为考究,内里家具陈设都是酸枝木做的,高雅名贵,当时影响极大,自此,广东人就把手上茶馆称之为上茶楼了。

广东第一家茶馆出现在什么时候,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从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明代时应该已有茶馆、茶坊或茶肆了。据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里所述广州城南濠畔情况:“当盛平时,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於秦淮数倍,今皆不可问矣”。屈大均所谓“当盛平时”自然指的是明代,“今皆不可问”指的是清初,从其所说“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於秦淮数倍”,可推出当时广州应该已有茶馆之设。清初尚可喜、耿仲明攻入广州城,兽性大发,屠杀广州居民七十万,一时十巷九空,经济、社会遭到极大破坏,珠江畔的酒楼茶肆,亦即全盘摧毁。从康熙中期开始,广东经济、社会开始得到恢复、发展,并逐渐繁荣,茶馆业也日趋兴盛,到清末,中高级茶馆已是鳞次栉比,这势头一直持续到民国。

广东茶馆以广州茶楼最为典型。旧时广州茶楼分为中高低三个档次。低档次的有一厘馆、二厘馆。这类茶馆陈设简单,一般只有几张桌子、几条凳子,门口挂一个木牌子,写着“茶话”两个字,供应简单的茶水和芽菜粉、松糕、大包等大众化食品,是劳动人民歇脚、解渴、解饿的地方,因收费低廉而得名。清代同治、光绪年间,二厘馆遍布广州的大街小巷。中高档茶楼稍晚些才出现,如陶陶居、陆羽居、天然居、莲香楼、惠如楼、三如楼、多如楼、南园、北园等,这些茶楼大多建筑豪华,陈设富丽,布置雅致,地方宽敞,座位都有几百上千个。当然,茶叶、器具都很讲究,多半是瓷壶沏名茶,佐以高级点心。中高档之间的区别就在于规模大小以及陈设、布置的档次差别。现在广州还保留有不少传统的茶楼,至今生意兴旺。如 1880 年创建的陶陶居,招牌是康有为题写,曾经风光一时,后经营不善倒闭,现在的陶陶居是 1933 年改建的。改建后的陶陶居大楼为三层钢筋混凝土结构,上盖六角亭,其建筑彩画灰饰等极富岭南风格。内设卡座正厢、大观园、濠溪清舍、八卦图形等卡位,

别具匠心。室内装修精美典雅，四壁悬挂名人字画、诗词对联。室内设置的七彩玻璃屏风中刻以诗画，供茶客欣赏。陶陶居，寓意来此品茗，乐也陶陶，加上服务一流，美点上乘，历来为中外文人墨客、商界人士聚会之所。鲁迅、许广平、巴金以及粤剧名伶薛觉先、白驹荣等，都曾是陶陶居的座上客。又如1889年创建的莲香楼，共有三层，首层门前为骑楼，层高约6米，两边各有一根爱奥尼柱式。二三层外观分为三间，各用四根爱奥尼柱式。最上方为半圆形及曲线形组成的女儿墙。大门门楣上挂的“莲香楼”三字金漆横匾是翰林学士陈如岳所书。1984年莲香楼进行了全面的装修，辅之以精美典雅的家具、岭南传统木雕和现代灯饰，使百年茶楼面貌焕然一新。莲香楼的茶点非常有名，它的莲蓉月饼驰名省港澳，素有“莲蓉第一家”之美誉。广州茶楼的建筑风格是折中糅合的多样化，或偏重传统特色，或模仿西洋古典风格，这一点受岭南多元文化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前，广州的茶肆多半是以一间较大的房子为之，间或有两层或三层的木楼。四角大方桌为茶台，日字型的凳子为座位。盅沏茶。到了20世纪初，茶楼喝茶的座位开始演变成四种形式：散座、厅座、卡座和房座。散座：一个大房子大堂内，摆满圆桌或方桌，每张桌子随意坐多少人，只要坐得下，彼此互不侵犯。这种座位，茶水钱最便宜，乃市井茶座，大众化的茶座。厅座：比散座高一级，一个厅摆着多张云石圆台桌，每张桌可容纳三、四个饮茶群体。厅的四壁，挂着中国画，略显雅致。卡座：这是19世纪末，西方咖啡座通过香港传播过来所形成的茶座座位。每个卡座，设一张小小的长方形桌子，桌子两边设有两张长型的高背椅。喝茶者对面而坐，每个卡座可坐四人。卡座与卡座之间，由所坐的高背椅隔开。每个卡座壁上挂有壁瓶，上插“万年青”之类绿色植物。这种卡座又比厅座高一级，茶水费比厅座高。房座：这是一种用木板隔成的相对独立的房间，里面设有茶桌和座位，四壁加以粉饰和装潢。在房座喝茶，茶水费比上三种座位贵得多。这种房座，经常接受茶客预先订座，一经订座，房子门口便挂出一块小牌写上某某先生预定，其他茶客见字便止步。这种房座专供官僚和大商贾接待客人饮茶或欢宴之用⑦。

广州的茶楼有一特色，特别讲究门联，曰之“茶联”。在整个广东，你经常能看到这种多元文化的并存，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中国与外国，并且并行不悖。对联是中国古代文化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广州茶楼在这方面体现了传统。广州不少著名茶楼不惜出巨资征集茶联。如清末大同茶楼出资征联，要求上下联内须有“大”、“同”二字，后得一联：“好事不容易做，大包不容易卖，针鼻铁薄利，只想微中剥；携子饮茶者多，同丈饮茶者少，檐前水点滴，何曾倒转流”，这副茶联，将卖茶微利、人世冷暖寓于联中，质朴而又充满哲理。陶陶居也曾征得一联：“陶潜善饮，易牙善烹，饮烹有度；陶侃惜分，夏禹惜寸，分寸无遗”，此联巧妙地把“陶陶”二字嵌于上下联之中，又与茶楼营业密切相联。还有一不知名的茶楼兼酒楼的门联也极为有趣：“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喝一杯茶去；劳心苦，劳力苦，苦中寻乐，再倒二两酒来。”这副对联语带机锋，新颖贴切，雅俗共赏，妙趣横生。不光广州的茶楼有茶联，整个广东的茶馆，乃至乡村小茶坊、茶肆，甚至路边的茶亭、茶寮都有寓意深远的茶联，给广东的茶文化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大概是商品经济发展得早也发展得较好的缘由，广州茶楼的服务让你有宾至如归的感觉。首先一进门就有迎宾小姐恭敬有礼的问候，随后领至座位前就位；接着服务员小姐马上会走过来询问饮什么茶，吃什么糕点，若一时拿不定主意，还会代为参谋。冲茶也很讲礼仪。广州人讲究“茶靓水滚”，“茶靓”指茶的品质上乘，能满足茶客的不同口味，不会以次充好；“水滚”，就是泡茶的水要“滚开”，尤以煮至刚冒气泡的“虾眼水”为好，如此才能沁出茶的真味。泡茶时，还要“悬壶高冲”，沸水飞泻入壶，这样才能使茶叶上下翻动，充分泡出味来。倒茶时，要“茶斟八分”，以示谦和有礼。服务员这么有礼仪，茶客自然也要讲礼仪了。服务员倒茶时，客人要以食指和中指轻扣桌面表示谢意。传说这一礼仪源自乾隆下江南时流传下来的礼俗。一次扮作仆从的皇帝给扮作主子的随从斟茶，随从感恩戴德、惊恐万状，本应下跪叩拜，但又怕暴露了皇室身份，于是灵机一动，遂以两指微屈，轻扣桌面代之叩礼，并一直传袭至今。此外，在广州茶楼里，当客人需要续水时，无须叫唤服务员，只须把壶盖打开架在壶上，服务员便会意而来。关于这一礼仪的由来，相传是过去有一富商到茶楼饮茶，叫堂倌给他加水，堂倌刚把壶盖打开，他“呵”大叫一声，赖称壶中有只价值千金的画眉给堂倌放飞了，定要茶楼赔偿。老板无奈之下，从此规定，茶客凡要加水者，自己打开壶盖，以防有诈。时至今日，这习惯动作已成为茶客要加水的示意信号，无须叫唤服务员了。

广东的茶馆除了城市茶楼外,乡村小茶馆也很有特色。广东位于珠江流域,大小河流很多,乡村小茶馆多半就傍河而建,小巧玲珑,约莫只容七、八张方桌,二十来个茶客。有的小茶馆是水榭式,半依岸,半临水,味道更佳。过去多是竹或木结构,树皮编墙,八面来风,现在改为混凝土结构,也有砖木结构的。乡民们劳累了一天来到这些小茶馆,歇歇脚,喝杯茶,抽袋烟,吃点点心垫垫肚,唠嗑唠嗑生活,一天的劳累便在这消融了。这些小茶馆的环境虽比不上城市茶楼的富丽高贵,所做的茶点也粗糙,但有质朴的韵味,更贴近饮茶的真意。

广东的茶馆是一种平民化的茶馆,它没有什么高深的茶文化,是和老百姓的世俗生活、饮食起居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概源于岭南文化中的务实、平民化特征吧。

(1)与饮食相结合。这是广东茶馆最大的特点。广东地处热带、亚热带,体力消耗快,水分流失多,因而在饮食上以少食多餐,且多汤水为宜。这大概就是广东人“三茶两饭”以及喝茶时要“一盅两件”的缘故吧。广东的茶道和食道可以说结合得很完美,茶中有饭,饭中有茶。小碟、小碗、小笼、小盘摆满一桌,把广东人吃茶的情调表现得淋漓尽致。事实上,现在广东的茶馆和酒楼在经营上已经趋同,不像过去,茶馆不办酒席,酒楼不办茶市;现在的茶馆也经营酒水、饭食生意,酒楼也提供早晚茶服务。广东的茶馆“三茶”里面以早茶最为热闹,从凌晨四、五点直到中午十一点,饮早茶的客人是络绎不绝。最早的一批是老人家。老太公、老太婆起得早,边呼吸新鲜空气,边慢慢悠闲地踱到茶楼,叫个“一盅两件”,和邻座唠唠家常,半个上午就过去了。第二批是要工作的职员,匆匆忙忙来吃个早点就上班了。第三批是陆续来茶楼的商人,边喝早茶边谈生意。中间还有很多有闲阶层,例如太太、小姐们来茶楼打发时间。晚茶也很热闹,多是年轻人来消夜的,一直要营业到两、三点。广东得风气之先,发展早,因而有钱、有闲人多,茶楼是最好消磨时间的场所。

(2)与商业相结合。在广东,如果不“泡”茶楼,就融入不了广东的商业社会,如果没有“泡”茶楼的习惯,就意味着少了许多发财的机会,因为广东人的许多生意都是在茶楼谈的,许多的生意机会也是在茶楼听到、看到或悟到的。在茶楼谈生意有诸多好处,一是气氛和谐,功利性少了很多,更能赢得生意伙伴或竞争对手的信任;二是节约了时间。别看广东人喝茶喝半天,但还是节约了时间,既喝了茶,又吃了饭,还谈了生意。三是所费不多。在茶楼请客人饮茶比上酒楼便宜多了,也不寒酸。这非常符合务实的广东人的心意。

(3)茶品、茶点、饮茶方式多样。广东人饮茶品种较多,有红茶、绿茶、乌龙茶、花茶、元堡茶等种类。茶点更是五花八门。清代的时候,茶点种类还不多,仅有蛋卷、酥饼之类。清末民初,广东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汇的窗口,茶馆自然也受到西方的影响,出现了面包、蛋糕等洋味点心。民国时期,茶馆点心日趋多样化,增加了各种富有岭南特色的包点,以及岭南特有的用肉类制作的“烧卖”,如豆沙包、麻蓉包、椰蓉包、叉烧包、腊肠卷,以及排骨烧卖、干蒸烧卖、虾饺烧卖等。及至现在,更是各式茶点都有,西洋的、日式的、港式的、江浙式的,应有尽有。广东人饮茶方式也多样,除了最简单的泡茶外,还有煲仔茶和功夫茶等。潮汕人的功夫茶最值得推荐。这种饮法源于清代。饮功夫茶,要配有一套相应的茶具,俗称“烹茶四宝”。功夫茶的冲泡别具一格,先取水洗涤茶具,放入茶盘,待水开时,将茶具一一烫过。再在罐中放入茶叶,冲入滚沸的开水。讲究一点的,还将头道水迅即倒掉,以作洗茶。当水冲满至罐口,人们用罐盖拨去表层白沫,当即加盖,以保全香气。略等片刻便转圈轮番注入几个小茶盅中,以保证每只茶盅的茶水浓度一致。这种转着淋分开法俗称“关公巡城”。淋到最后,还要轮流着一滴一滴平均地往4个小茶盅里滴,又称“韩信点兵”。

茶虽入盅,但别急着捧杯喝茶。按这功夫茶的规矩,应先举杯置于鼻端,品闻一下扑鼻的清香,接着才呷茶入口。这样边饮边冲,可以连饮三五杯,最多的喝到第五道,便将茶根倒掉,换上新茶叶如此周而复始。这功夫茶虽然是一种品茗的艺术,但太费功夫,恐怕不是一般人常常能喝的。正如鲁迅在《喝茶》中说得好:“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功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

(4)大众化。广东茶馆的大众化一是体现在茶客上,二是体现在价格上。广东是个商业化社会,向来“官本位”思想不重,同时广东总体经济水平较高,贫富差距不大,中产阶级众多,因而上茶楼的茶客基本上没有什么身份、阶级差别意识。商人、公职人员、学生、企业主、工人、个体户、自由职业者、退休人员,等等,都上茶楼“叹”茶。广东茶馆的价格也比较经济。叹个早茶,个人消费不算节俭,举家相聚也算不得破费,待客会友也不寒酸,总体上属于大众化消费,例如,全家一起去,每个人消费20-30元,一家五口百多元就解决了。当然,茶

品和茶点都有高中低档,愿意的话可以用鱼翅漱口,这当然就贵了。

广东的茶馆喝茶的氛围不浓,人们更注重的是佐茶的点心,在这里,茶已经成为次要的东西了。但因此也使得广东的茶馆与众不同,特色鲜明,“饮茶粤海未能忘”。

四、吴越文化与浙江茶馆

1、吴越文化

对吴越文化的认识一般是在两个层面上,一是指吴地与越地的文化。指的是从原始先民开始到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今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东南部的吴国与越国的文化。二是指吴越国的文化。吴越国是在唐朝末年,中央权威下降,各地纷纷出现地方性的割据政权,即所谓的“五代十国”中的一国,由临安人钱鏐在杭州创立,历时近百年,统辖一军、十三州、八十六县,范围包括今江苏南部、浙江全境、福建东北部一带。因此,所谓吴越文化,主要指的是在浙江及其周边这块土地上所形成的具有从古及今的历史延续性和连续表现形式的区域文化。

浙江位于长江三角洲南翼,东海之滨。地势西南部高,东北部低,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呈梯度下降。西南部为山区,中部以丘陵为主,东北部为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土层深厚,水网密布。东面临海,海域辽阔,岛屿众多。这样的地理环境使生活在其中的吴人和越人自古以来就有两种不同的民性、民风 and 民俗,使得吴越文化呈现出一种矛盾的统一。浙江以钱塘江为界,划分为江东、江西。江之西为吴地,吴地以太湖流域为中心,自然生态环境优越;江之东为越地,越地倚山面海,历史上遭遇多次海潮侵袭,生存环境恶劣,因而越地先民断发文身,辟草莱,浮大泽,培养了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旧《浙江通志》记载:“浙东多山,故刚劲而邻于亢;浙西近泽,故文秀而失之靡。”明末浙东临海人士王士性在他的著名地理著作《广志绎》中也提及,“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喜饰鞶帨多巨室大豪,若家僮千百者,鲜衣怒马,非市井小民之利。浙东俗敦朴,人性俭啬椎鲁,尚古淳风,重节概,鲜富商大贾。”

浙江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湿润,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太湖流域水网交错、土地肥沃,适合稻谷生长。据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期,吴越一带就出产稻谷,而且已有了籼稻、粳稻和过渡型三种稻谷类型,到明清时,已发展到 1000 多种,因而吴越自唐宋以来一直是中国的鱼米之乡,同时还是丝绸之府。我国种桑养蚕历史悠久,浙江的杭嘉湖地区是桑蚕文化的发源地,可以追溯到 4700 年前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早期。除了桑蚕,浙江还是我国黄麻、绿茶和毛竹的主要产地。浙江境内矿产资源丰富,主要是非金属矿,有“十块石头三把土”之说。此外,动植物资源、渔业资源、油气资源也极为丰富。

吴越也是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早在 5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原始人类“建德人”在今天浙江西部的山区活动。到了距今六、七千年至四、五千年间,浙江境内人类活动的范围已相当广泛。浙江省境内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达百处以上,分别属于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在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中,有种类齐全的骨、石、陶、木制成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大量保存完好的古代稻谷,榫卯结构清楚的木构件,以及色彩鲜艳的漆碗,依然能吹出动听音响的原始骨哨等,表明了中华民族的祖先早在七千多年前,就已经创造出了令人惊叹的史前文明。在春秋战国时期,浙江分属吴、越两国。以会稽(今绍兴)为都城的越国,在越王勾践时期曾经相当富强。但直到汉代,吴越文化较之中原文化仍落后不少,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三国时,孙权建立东吴政权,独霸江东六郡,他在位五十余年间,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浙江当时做为东吴国的大后方,也得到了一定的开发和发展。吴越文化真正兴起并超越中原文化成为中国经济文化重心,是从西晋末年永嘉南渡开始的。公元 317 年,西晋灭亡,在这一年前后,据《晋书·王导传》载,由于当时北方战乱,“中州士女辟乱江东者十六、七”。南渡的北方移民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多是皇室贵族、官僚地主、文人学士,具有很高的文化素质,他们的到来带来了北方的先进文化也提高了江南一带的文化水平。到南北朝时,南朝文化已略胜北方的东魏和西魏。隋唐以后,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开始南移,其中吴越是重中之重。特别是经过了公元十世纪左右钱鏐在杭州建立,历时近百年的吴越国和定都杭州一百五十年的南宋,自

此以后,吴越就成为了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到了明清时期,吴越文化更是达到了成熟、鼎盛状态,它精致的文化特质表现得淋漓尽致。

浙江经济开发较早。早在东汉时期,浙江就已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煮盐业、制瓷业也已达到相当的水平。公元三世纪以后,浙江经济获得进一步发展,商业也日渐繁荣。到了隋唐时期,浙江的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农业产量大有提高,杭州、嘉兴地区成了中国江南重要的粮食产地。丝织、瓷器、造纸等手工业生产发达,商品货币经济活跃,明州(今宁波)成为当时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贸易港口。公元十世纪以后,浙江进入封建经济的繁荣时期,成为当时中国的富庶地区之一。农业生产不仅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而且经济作物的种类和种植面积也有所扩大。丝织、制瓷、造纸、印刷和造船业等已居当时中国的领先地位。

商业性集镇纷纷兴起。海外贸易不断扩大。丝绸、茶叶、瓷器是当时输出的主要商品。现在的宁波、温州是当时中国东南部进行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埠,海上航运可达日本、朝鲜和东南亚诸国。

繁荣的经济孕育了昌盛的文化。浙江历史上出了很多文化名人。思想家王充、王阳明、黄宗羲、龚自珍;诗人贺知章、骆宾王、孟郊、陆游;书法家王羲之;科学家沈括;戏剧家李渔、洪升等都是杰出代表。20世纪,中国文学巨匠鲁迅、茅盾,教育家蔡元培;著名科学家茅以升、竺可桢、钱学森、陈省身;以及李叔同、王国维、夏衍、艾青、徐志摩、陈望道、马寅初、金庸等一批名人均为浙江人。据考证,自唐代开始科举,中国历代共考出文状元596名,浙江有65名,占了十分之一强,从明清二朝状元人数看,江浙二省将近占了三分之二;而在考中的进士人数中,浙江共有6379人,名列全国第一^⑧。此外,浙江的书院众多,宋明以后,浙江是全国书院最多的省份之一;而藏书之盛更是闻名全国,宁波天一阁、杭州文澜阁、湖州嘉业堂、瑞安玉海楼等都是著名的藏书楼。这种尚学之风也成为浙江文化的一大亮点。

先人在《宋史地理志》中曾概述浙人的性格气质“人性柔慧,尚浮屠之教,厚于洋味,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这尽管概述的是浙人的民风民俗,但它基本描述了吴越文化的核心内容:

(1)重利、务实。浙江人多地少,向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土地容纳不了这么多的农耕人口,自然从手工业和工商业中找寻出路。历史上越国人民就好经商,有“越子俗好贾”一说。在中国古代社会,以农业为本,商业、手工业为末,重农抑末是长期坚持的国策,而越国则不然,它实施的是“农末俱利”政策。勾践时期越国大夫计然说:“处于吴、楚、越之间,以鱼三邦之利,乃知天下易反也。”^⑨生长在具有重商传统土地上的吴越思想家们纷纷提出注重工商,倡导功利的思想。如永康学派代表陈亮指出:“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病”,主张农商并重的政策和有利于富民商贾的措施。永嘉学派领军人物叶适明确反对义利两分,疾呼要“通商惠工,经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心学”代表王阳明主张士、农、工、商“四民平等”,不再以农为本,商为末。明末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则率先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直接质疑重农抑商的价值观。这些思想既是当时浙江人文经济发展的反映,反过来又形成为吴越文化传统,浸润、熏陶着吴越人民。

重利与务实分不开,务实是重利的基础。浙江古代学者不光强调伦理道德上的实践,如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反对记诵词章之虚文,而主张事上磨炼;而且特别强调要与平凡的生产生活相联系。如王阳明还认为“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重视“闻见”之知,不要图虚名,“不通其说,则不可以要其誉”,要从平凡小事踏踏实实做起。

(2)开放、创新。浙江独特的地理环境培养了浙江人外向、开放的品质。一方面人多地少,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现状使浙江人的故土观念较为淡薄,为求生存,四海为家。古越民族就是一个喜“山行水处”,好迁徙移居的民族,所以,“越”字是“辵”(石斧)加一个“走”字旁。古时候浙江交通不便,偏于一隅,狭窄的地域也使得浙江人有强烈的向外发展的冲动,因而出现了龙游商帮、宁波商帮、绍兴师爷等;近代以后,又有大批浙人侨居国外,如著名的青田侨民等。另一方面,面海的环境和生产生活又培育了浙江人开阔的心胸、富于冒险和开拓的精神。早在先秦时期,浙江就与朝鲜、日本、印度、大食以及中国其他沿海省份有贸易往来。自宋以后,杭州、温州、宁波等一直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悠久的对外交往历史,开阔了浙江人的视野,培育了浙人乐于接受新事物,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开放性文化心态。

开放必然会引发创新。从吴越文化的历史发展看,吴越文化的兴起得益于魏晋南北朝以后的南北文化交

融,后江浙一带的学术大盛,皆因在开放的背景下,兼采众家之长所致。明中叶以后,西学东渐,浙江是较早和较多接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地方,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浙江人接触到了大量同资本主义文明相关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进一步弘扬和光大了浙江传统的开放、创新精神。

(3)精致和谐,讲究人性。浙人“人性柔慧,……厚于洋味”,这种文化特质体现在吴越文化的各个层面,物质、行为、制度、精神乃至人物中。不像巴蜀地区,山高峰险,滩多浪急,吴越地区的山水秀丽、温柔,给人留下清丽柔软的印象,对吴越人民的审美情趣、生活习俗、传统观念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如色彩淡雅的吴越服饰、精细雅致的苏杭刺绣、造型玲珑的苏州园林、做工精美的杭州瓷器、节奏舒缓的苏州评弹和唱腔优美的江南越剧,形成了吴越柔、细、雅的文化个性和精致和谐的人文精神。这一点不光体现在吴越的物质、精神层面,也体现在江浙人物当中。浙江人大多心灵手巧,机敏灵活,而且注重穿着打扮,讲究生活情趣。自宋以后,江南成为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特别到了明清时期,江南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才子佳人如过江之鲫,吴越之地更是如此。这样的环境、经济文化氛围加上浙人天性的“柔慧”很容易让人们养成注重生活享受、讲究生活品质的文化心态。

2、吴越茶业

吴越地区是产茶盛地,也是我国绿茶主要产区。浙江杭州在今天更被誉为“茶都”,中国茶业博物馆、中国茶叶研究会、国家茶叶检测中心、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中国茶叶学会等10多个国家级的茶叶中心总部均设在杭州。关于茶文化研究的协会、学会、杂志以及遍地生花的各色茶馆、茶艺馆以及每年举行的“西湖龙井开茶节”和国际茶博览会更是把杭州打造成了茶文化中心,也使得茶文化成为了杭州的又一张金色名片。

关于吴越茶业最早可以追溯到陆羽《茶经》在汉代茶事中的记载:“汉,仙人丹丘子、黄山君,司马文园令相如,扬执戟雄。”据考,丹丘是今浙江海宁县天台山的支脉,丹丘子和黄山君饮茶的故事说明汉时茶的生产和饮用已经传到长江下游和浙江沿海一带了。不过,这只是一个传说,没有确实的说理。真正有据可考的关于吴越地区饮茶和生产茶业的历史是从三国开始的。据《三国志·吴志》记载:孙“皓每饗宴,无不竞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嚶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椀以当酒。”表明三国后期至少在江东吴国的统治阶级中间,已开始流行饮茶^⑩。到东晋时,茶已成为建康和三吴地区的一般待客之物。如《世说新语》载,任育长随晋室南渡后,很不得志。一次他到建康,当时一些名士迎之石头(今南京城郊),“一见便觉有异,坐席竟下饮”,于是便问人云:“此为茶为茗?”⁽¹¹⁾随着茶叶饮用的普遍,吴越一带茶叶的生产在两晋时有了一定的发展。到南朝时,吴越茶业得到了较大发展。如《桐君录》记载:“西阳(今湖北黄冈县东)、武昌、晋陵(今江苏常州)皆出好茗”。

唐朝是我国茶业发展的初兴时期,那时的茶叶饮用已普及到北方,茶叶生产在南方的区域已扩大到八大茶区,其中吴越就占其二。据陆羽在《茶经》中记载唐肃宗、代宗时南方产茶的情况:浙西有湖州、常州、宣州、杭州、睦州、歙州、润州和苏州;浙东有越州、明州、婺州和台州。著名茶人陆羽安史之乱后,随流亡难民流落到浙江湖州,湖州是名茶产地,陆羽在这写下了他的传世经典名作《茶经》。唐中期以后,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重心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也随之转移到包括赣东北在内的浙西茶区了。

南宋建都杭州后,吴越的茶业包括茶馆业更是大发展起来。宋朝南迁临安(今杭州),汴京的达官贵人和中原流民也随着南迁,因而,临安的茶馆融合了南北茶馆甚至其他一些茶馆文化的特点,首先在茶馆面貌上改革一新。如《都城纪胜》载:“大茶坊挂张名人书画,在京师(北宋汴京)只熟食店挂画,所以消遣久待也。今茶坊皆然。”其次在茶馆的营业手段上,也有不少的发展。据记载,临安的茶馆,在南宋初年时,四时除卖奇茶异汤外,冬月还添卖七宝擂茶,暑天添卖雪泡梅花酒等。开始卖梅花酒,大致无什么热闹,但后来如《梦粱录》所记:“向绍兴年间,卖梅花酒之肆,以鼓乐吹梅花酒之肆,以鼓乐吹梅花引曲破卖之……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顿奇松异桧等物于其上,装饰店面,敲打响盏歌卖。”这敲打响盏歌卖,无疑就是借鉴梅花酒肆鼓乐吹曲破卖的一种发展。此外,另一个发展就是茶馆类型和功能上更加多样化。宋室南渡使杭州居民成分变得复杂,各色人等都有,为适应各不同阶层和职业者的不同社会需要,于是出现了适合各个阶层的多种类型茶馆。对此,《都城纪胜》在茶坊介绍中,有这样的记载:“茶楼,多有都人子弟占此聚会,习学乐器,或唱叫之类,谓之挂牌儿。

人情茶坊,本非以茶茶汤为正,但将此为由,多下茶钱也。又有一等专为娼妓弟兄打聚处;又有一等专是诸行借工卖伎人会聚行老处,谓之市头。水茶坊,乃娼家聊设桌凳,以茶为由,后生辈甘于费钱,谓之干茶钱。”^②

明清时期,吴越茶业发展达到鼎盛。不光茶叶种植、茶叶贸易在扩大,茶叶栽培技术、制茶技术在发展,茶学也空前繁荣起来。然盛极而衰,随着国外茶叶竞争的加剧以及茶叶贸易高潮时国内茶园的一哄而上,到清末,我国茶叶出口急剧下降,大批茶园被毁,吴越地区也不例外。直到百年后吴越茶业才再次繁荣和振兴。

3、浙江茶馆

浙江茶馆的代表是杭州茶室,之所以称呼为“茶室”,而不是“茶馆”,是因为杭州茶室比之别地茶馆多了一份“仙气”、“佛气”和儒雅之风。杭州茶室把吴越文化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据统计,目前杭州市区大大小小的茶馆已超过1000家,其中不少是五六百甚至一两千平方米的大中型茶馆,茶馆业的年营业额已达十亿元。杭州茶馆可能没有成都茶馆多,但在人均占有量、专业水准和对外输出人才、辐射影响这三方面均居全国第一。杭州茶馆的触角已经伸及宁波、苏州、上海甚至更远的北京等地,湖畔居、和茶馆、心源、门耳茶坊等品牌茶馆更是远赴外地,开出了连锁茶馆。可以说,杭州茶馆业是成功的。目前,杭州也被全国公认为茶馆业做得最好的城市。杭州茶馆之所以做得这么好,与它得天独厚的环境分不开,更与吴越文化分不开。

杭州茶室有几大特点:

(1)茶、景交融。杭州茶室向来讲究名茶配名水,品茗临佳境。因而杭州茶室的环境都特别好,这里的环境不仅指的是内环境,更指的是外环境。历史上杭州茶室就注重选址,除了开在传统的各水陆码头、交通要道、商贸市场等人口密集区,吴山、玉皇山、宝石山、云栖、龙井、九溪、三潭等风景名胜区分也开满了茶馆,更别说西湖一带。

清代小说家吴敬梓在乾隆年间来杭州游玩,对吴山茶室印象很深,在《儒林外史》中花了大量笔墨描述了“马二先生”上吴山品茗的情况:马二先生来到山上的一条大陆上,见着“一间一间的房子”,那房子“也有卖面的、也有卖茶的、也有测字算命的。庙门口都摆的是茶桌子。这一条街,单是卖茶就有三十多处,十分热闹。”“马二先生正走着,见茶铺子里,一个油头砂面的女人招呼他吃茶。马二先生别转头来就走,到间壁茶室泡了一碗茶。忽见有卖的蓑衣饼,叫打了十二个钱的饼吃了,略觉有些意思。”马二先生继续走了上去,“又看见一个大庙门口摆着茶桌子卖茶,马二先生两脚酸了,且坐吃茶。吃着,两边一望,一边是江,一边是湖,又有那山色一转围着,又遇见隔江的山,高高低低,忽隐忽现。”此虽为小说,但真实地描绘了当年吴山茶事之盛况以及茶景交融的情景。

清末,西湖上城墙高耸,游船码头多在涌金门一带,这里的“三雅园”、“藕香居”两茶馆很有名气。其中“藕香居”系尼姑所开,门对西湖,三面临水,多载荷花,远山近水一览无遗,为非常清静高雅的品茗场所。有两副茶联非常有名,一联云:“欲把西湖比西子,从来佳茗似佳人”,另一联云:“四大皆空,坐片刻无分尔我。两头是路,吃一盞各自东西”。^④把杭州茶文化的两大特色都点出来了,一是茶、景、意趣和谐统一;二是杭州茶文化与禅宗的密切关系。

清末以后,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茶馆越发向风景名胜区集结,一些著名的景区如平湖秋月、西冷印社以及灵隐、虎跑等处都设有茶馆。明初,西湖边拆围墙改马路,西湖边及西湖各风景点均有茶室,且一年四季皆有独特处:冬春来,乍暖还寒时,最易于柳浪闻莺处的“莺馆”品茗,四面樱花、桃花重重,嫩柳青青,莺啼声声,春光扑面。暮春时节则可于“镜湖厅”小坐,此处有紫藤数株,繁花似锦,垂垂挂络,芬芳扑鼻,品茗其间,自可阅尽人间春色。夏日炎炎,则云栖、烟霞等处茶室,清静宜人,自有玉簪修竹抵挡难耐的暑气,香茗在手,别有一番清凉感受。秋季则可到白堤之平湖秋月,月圆时分,恍若置身琼楼玉宇,令人情不自禁想以茶代酒,举杯邀明月。若是秋雨霏霏之际,则可往曲苑风荷处的“湛碧楼”,凭窗四望,湖山烟雨朦朦,边品茗边聆听雨打荷叶之声,令人思绪万千。冬日就应该去昭庆寺的茶楼了,尤其是雪后更妙,楼内红灯高悬,茗香满室,暖意融融;露外湖山银装素裹,一望无际,恍如仙境。^⑤

更为别具一格的是西湖水面上的“船茶”。旧时西湖边有一种载客的小船(现已恢复),摇船的多为青年妇

女,当地人称作“船娘”。小游船布置得干净整洁,搭着白布棚,既可遮阳又可避雨。舱内摆放一张小方桌和几只椅子,桌上有茶壶、茶杯。游客上船,船娘就先沏上一壶香茗,然后荡开小船沿湖划去。一路上桨声 乃,船娘浅唱低吟,吴依软语,情趣盎然。游客边品茶边欣赏湖光山色,真是一大快事!整个杭州就是一个大茶寮,茶与人、人与天地、山水自然契合,融为一体,这才是品茗的真趣。

现在杭州的茶室除了在外部景观上传承了过去的传统,在内部景观的布置上,也尽可能地让茶和景融为一体,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如南山路上的西湖国际茶人村,一派古典的江南园林建筑,粉墙黛瓦、山光竹影、古筝泉鸣、香烟袅袅;而紫艺阁茶馆则用绿叶植物装点,田园风情弥漫。

(2)精致、艺术化。杭州茶室在店堂的布置、冲茶的技艺、茶艺表演、茶文化活动上乃至精美的茶点无不体现这种精致和艺术化的品味,这和浙人“柔慧”的性格分不开,和吴越文化中的“精致和谐”分不开。

浙江向来是才子佳人辈出的地方,品茗赏景、吟诗作画的风气很盛,而书画与佳茗都蕴涵一个“雅”字。早在南宋时,就有茶馆用名人字画装点四壁,时至今日,更是如此。此外,在店堂布置的各个环节,都体现出一种文化意韵。如在太极茶道苑里,所有的栏杆、墙板均木纹显露,茶桌、凳椅都不施半点油漆,一切以天然见人。收音机里放的是“小热昏”,一种旧时杭州民间的说唱艺术,让人感受到一些老杭州的意味。而和茶馆则用古书的旧版绘图做墙纸,用清代的马车轂镜配以玻璃制成别致的茶桌;茶馆内放着明代紫檀小案、清代红木荷花扶手椅、清代民用小炕桌等各式古代生活用具和各种陶瓷、木雕、银器等。丰达茶馆的每扇玻璃窗上,都装饰着米芾的“茶”字,室内的方柱上、四面墙上都有杭州书法家书写的古今著名茶联、茶诗,还挂着山水、人物画。

杭州是较早引进茶艺馆的城市。茶艺馆是茶馆业界的新型态,是讲究文化底蕴和品饮艺术的茶馆。最早的茶艺馆出现在 70 年代的台湾,内地第一家茶艺馆是 1985 年在杭州落成的茶人之家,由于茶艺馆的经营理念 and 吴越文化相契合,因而 90 年代后,在杭州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了很多茶艺馆,成为杭州茶馆的一大特色。如青藤茶馆、凡人阁茶馆、丰达茶馆、太极茶道苑、八方缘茶坊、墅园茶艺馆、茶人村等都是其间名声远扬者。茶艺馆都讲究冲、泡茶技艺,其实中国古代的冲茶、搽茶技艺可谓出神入化,可惜现在已极为罕见,太极茶道苑可以说还保留了一些。在太极茶道苑,可以欣赏茶博士从二楼泡茶、取长嘴壶从身体各处演绎泡茶、罗汉茶礼、道家行茶,它们许多精妙绝美之处,无不让人叹为观止。一般茶艺馆的冲茶是从涤器的准备和煮水开始的,茶具必须洁净干燥,放在干燥的竹架上。水的温度很重要,煮到什么程度要因茶而异,如冲高档绿茶,要将煮沸的水搁几分钟,待水温到 75℃—85℃左右再冲下,且不要加盖,以免叶片闷黄。而沏红茶、乌龙茶,尤其是紧压茶,则非用滚沸的水冲沏不可。接着是冲沏,冲沏时先要将茶杯烫热,然后用拇指、食指和中指呈三角形轻轻地撮取投放于杯中,冲沏也有讲究,有“高冲低行”之说,古人称之为“鲸波乍起”。其手法是水壶嘴对准茶杯(壶)低泡,随即抬高,从高处冲下,使茶叶受水的冲力在杯中旋转、上下浮动,使茶叶内的有效成分能均匀地溶出。待水量达 8~9 分满时,迅速放低壶位,减慢冲泡速度,这样可避免声响,亦免茶汤泛起泡沫。沏茶师在冲茶时还讲究“凤凰三点头”,一是向茶客表示敬意,二是将杯中茶叶冲得翻滚起来,让每一片茶叶都能受热均匀,使茶叶香浓,色泽鲜美。有的茶艺馆中还有自己的茶艺表演队,定期举办品茗艺术表演,演示艺术化、规范化的品茗艺术;有的茶艺馆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各种文化艺术活动,如书画展、茶文化交流、品茶会等等。

(3)种类、层次齐全。杭州茶馆的风格整体上属于雅,比较精致,不是非常民俗,但仍然有适合各色人等,不同层次消费需求的各种类型茶馆。早期杭州有书茶馆、曲艺茶馆、行业茶馆、“鸟儿茶会”;还有兼营澡堂业的茶馆,迎合浙人“白天皮包水,晚上水包皮”的喜好;有的茶馆以茶食出名,有的以出售特色商品出名,还有的以“特色服务”出名。现代杭州茶馆更是完整,各种类型、层次的都有。从层次上看,有“在野”的,在山上、在野外,多是游人或晨练者的歇息之地,或市民的聚集游玩之所。这类茶馆大多简陋,茶具实用无华,茶叶一般,价钱便宜。有和餐饮结合在一起的比较实惠的茶馆,每人只花 38—58 元,可以在茶馆泡一天,中餐也解决了,水果、小吃都有。这类茶馆通常以茶点著称,特别休闲,而且服务细腻,时不时弄些“小恩小惠”讨消费者的欢心。比如出名的“五小”服务:小技巧、小折扣、小礼品、小客套、小特色,便是这类杭派茶楼特有的。有讲究文化品味的茶艺馆,这类茶馆包括可以阅读的书茶吧、可以上网的网茶吧、可以买画的画茶吧。还有更高档的,可以望湖赏景,进行商务会谈的茶馆,如潮畔居。从种类上看,有定位休闲的茶馆,适合本地人乘休(下转 89 页)

贵宾,给国家和茶馆界争得了荣誉;他们先期经营的艰辛,也不是常人能经得起的!杭州《湖畔居》茶楼濒临西湖,享有的天然资源,早在700多年前,元初奥敦周卿就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评估,你比得了吗?

茶馆都以高起点的姿态出现,不顾现实,不考虑消费层次,高档茶馆“遍地开花”就不正常了。“卖茶水”,从走向市场的第一天,就是服务民众的。史料《广陵耆老传》中记载:“晋元帝时(公元317—323年)有老嫗每日擎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茶馆见诸文献记载的是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录》中:“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由此可见,茶馆的原始功能是服务于大众。纵观历史,茶馆由唐中期至南宋,进入鼎盛时期。作为服务性行业,其间承载着茶文化所表现的文化内涵。元明时期相对萎缩。清至民国发展复兴。它始终是作为大众经济中的大众文化的载体,是民众出入最广泛的公共活动场所,具有极大程度的开放性。历史经验表明,茶馆的立市之本是大众化,它是养育我们的一种生活文化,它的亲和力和凝聚力,表达着民族的个性,是我们的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茶馆服务民众,就要迎合民众的消费水平,多层次地适应市场需求。高层次的茶馆是城市的名片,每个城市都应该有,但不能城市的每个茶馆都是高层次,因为处于金字塔尖端的消费者在任何一个城市都是少数。达到小康的民众、中低收入的消费者是绝大多数。茶馆业主们要注意到他们的消费。天津的谦祥益文苑开设在天津商业摇篮的估衣街上,来这里白天喝茶可欣赏戏曲;晚上来可以听相声。为凸显茶馆本色,有时在节目开演前表演茶艺。花三五元钱就可以喝一杯大白毫或铁观音,多花钱可以喝上大红袍。品茶看演出的有白领青年、医生、公务员、老人、学生等,也有北京开车来的曲艺迷,甚至还有旅行社带的旅游团队。像谦祥益文苑茶楼的做法在天津还有几处。最近茶馆业向城市人口密集的社区发展,他们把收费起点有意降低,先把茶客请进来,实行丰俭由己的消费方法,很受消费者欢迎。

茶馆的多层次、多功能、多样化,对城市的经济繁荣,文艺事业的发展,社会的文明进步,普及茶文化及推动消费市场大众化,构建和谐社会,会发挥更好的作用。

(上接 87 页)

息日去休闲放松,一家人打打扑克、饮饮茶;西湖边的茶馆适合远道而来的游客边休息边赏景,也适合喜安静和谈恋爱的朋友,因为那里的环境清雅;曙光路上的茶艺馆适合文化品味较高、喜欢晚上去茶楼的朋友。还有很多茶馆别具特色,如“纯真年代”与书相结合;纳茶馆提供西方口味的泡沫红茶;少年宫的“酒旗风”走了欧化的路子、从装饰布置和提供成人游戏上,都很明显地体现出这一点;冬天的“望湖楼”适合看风景,断桥残雪配上红灯笼,别有一番味道;梅家坞可露天品茶,农家风情浓浓体现。这些层次不同、种类齐全的各色茶馆充分体现了浙人开放、创新的品质。

以杭州为代表的浙江茶馆充分体现了“和”的茶文化,人、环境、茶和谐交融,人在景中,茶在心中。在这里,品茗已成为一种艺术,可贵的是,杭州人并不把喝茶当作是一种时尚,而是精致的生活。(待续)